



深度

疫情阴云时的人权律师：新一轮抓捕与新一轮逃亡

“比封城更严重的，是封口。”

特约撰稿人 江雪 | 2020-02-13



2020年2月5日，北京街上，有一个戴了防护口罩的雕像。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2020年的第一个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年轻的中国人权律师常玮平，在这个人心惶惶的一月，经历了逃避抓捕、被秘密关押、暂时释放回家的全过程。他失去自由的8天，从1月13日到1月21日，正是肺炎疫情从掩盖到最终大规模爆发的时期。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更多的人在讨论武汉警方1月1日高调公布的一则消息：以“打击谣言”为名，警方传唤、训诫了八名最早在网络上发出“武汉发现SARS”预警的市民。事后人们发现，这八名“造谣者”，都是在武汉医院工作的医生。而一位名叫李文亮的医生也在1月3日被训诫，其后在接诊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于2月6日去世。

“比封城更严重的，是封口。”有时事评论者如是说。这里所说的“封口”，是指在武汉疫情中政府屡次隐瞒或延迟公布相关信息，致使疫情蔓延扩大，加之医疗资源的匮乏，致使封城后的武汉，疫情处于几乎失控的状态。

毋庸讳言，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公民社会遭受了严重的打压——无论是律师、记者，还是公益组织。对言论的高度管控、信息不透明、对公益组织的打压，导致它们再也难以成为政府救灾的补充力量。而这一切的后果，在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时候，由一个个普通人去买单，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少有人关注到，从2019年12月26日开始，当局对中国人权律师发起的新一轮抓捕行动。而这场因为一次公民聚会引起的抓捕行动，被评论者认为是在整体打压公民社会的背景下，严控言论自由——“封口”的另一种表现。



2020年1月17日，支联会与社民连等约20人，到中联办声援去年12月因厦门聚会而被捕的内地一批律师和异见人士。网上图片

抓捕与逃亡

1月21日，武汉肺炎爆发的消息使人人自危。但这一天，对人权律师常玮平的家人来说，却是喜悦的一天。

这一天，被秘密关押8天的常玮平重获自由。他被警方“取保候审”，暂时释放。当日中午，他走出了西安市高新路派出所的大门。他70岁的父亲，以无法控制的眼泪迎接了他。

2019年12月26日晚，圣诞节的第二天，住在北京的著名人权律师丁家喜突然被警方带走。同一天被抓捕的，还有家住烟台的前大学教师张忠顺，以及维权人士戴振亚、工人李英俊。

恐惧开始传递，坏消息一个个传来，正如同2015年“709”抓捕律师事件的翻版。12月30日，浙江律师黄志强的办公室被查抄，他本人被警方带走，随后被刑事拘留。同一天，四川律师卢思位在去香港开会时，被警方拦截，禁止他出境。从12月30日到1月4日，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有10多位律师、公民被传唤、抄家，甚至拘留或失踪。

家住陕西的常玮平律师，觉察到自己也有危险，遂外出藏身，躲避到西安的一位朋友家中。

1月12日晚上10点半，警察敲开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带走了常玮平。他的妻子在第三天接到警方的电话通知，常玮平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是近年来新修改的中国《刑法》中规定的一个强制措施。这个规定非常有利于警方，事实上已成为“秘密关押”的代名词。“被指定监视居住”的人，仿佛陷入信息黑洞。律师不能会见，外界难以获得他们的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他们被关押在何处。

在常玮平被带走之后的第四天，重庆律师张庭源受常的家属委托，赶到陕西宝鸡，向当地警方要求会见常玮平，但被拒绝。警方拒绝透露任何关于常玮平的信息，包括他被关押的地点。

与此同时，宝鸡市司法局在其官网上公示，注销常玮平的律师执业证书。

此时，一系列的信号已经很明显，警方的抓捕行为是针对12月初的“厦门聚会”。这场聚会发生在12月7日、8日。当时，丁家喜、许志永等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律师和热心社会事务的公民，相约在厦门，一起吃饭聊天，交流各自的经历以及对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看法等等。

有知情者介绍，所有人只是一起聊天，谈论了“一些观点，感受”。有一些人来的晚，甚至没有机会参与讨论，只是和大家一起吃了饭。

但这种以往常见的“饭醉”活动，在2019年的中国，已变得十分敏感。没有人料到，2015年7月的“709”律师大抓捕之后，新一轮对律师的抓捕，会从查处这次聚会事件而展开。



活跃的社会运动者、法学博士许志永。网上图片

在常玮平被抓捕之前，居住在北京的许志永已开始逃亡。在他离开家后的12月31日，警察上门搜查，查抄了他的书籍、保险箱等。并将他的女朋友以“寻衅滋事”为由扣押了24小时，戴上手铐，多次讯问，以追查他的踪迹。

许志永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也是活跃的社会运动者。他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2003年，因为在“孙志刚事件”（一名广州的大学生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被警方带走，在收容所里被打死的事件）中积极发声，他和滕彪（后成为著名律师）等人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他曾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北京的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后又成立了“公盟”，进行各种公民活动。2013年，在他和丁家喜等人发起的教育平权、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等一系列的小规模示威活动中，他被抓捕，并在2014年1月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2017年7月出狱。

离家逃亡的许志永，并没有停止发声。1月14日，他在推特上写道：“我在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流亡中抗争。告诉人们，黎明近了，自由近了，公义近了，爱，已悄悄到来……他们端坐的不是金字塔尖，而是火山口上。告诉人们寒风肆虐时，春天，已不再遥远。”

12月29日，在长沙，另一位人权律师文东海也开始逃亡之路。他的妻子周友芳回忆，12月30日，已于前一天外出躲避的丈夫突然告诉她，自己面临被抓捕，让她立即带着两个孩子去日本躲一躲。在朋友的协助下，两天后，周友芳带着两个孩子到达了日本，但一直到半个多月后，她都始终没有丈夫的消息。

逃亡中的文东海，其实在2018年6月已被吊销了律师执照。2015年的“709”律师大抓捕之后，文东海为失去自由的王宇律师辩护。他还代理了一系列人权案件。在他被吊销律师执照后，为了生计，他在长沙开设了一家法律服务公司。

周友芳回忆，在送她和孩子去机场的路上，文东海担心警察会在机场布控抓捕，所以在中途提前下车。临走的时候，他叫醒了在车后座熟睡的两个孩子，向他们道别。他拥抱了周友芳，叮嘱她：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然后就消失在了夜幕中。



律师丁家喜。网上图片

“蝴蝶不停扇动翅膀”

因“厦门聚会”第一个被抓走的丁家喜律师，今年53岁。和许志永一样，他是“新公民运动”的组织者和关键人物。

如果不是参与到一系列公民运动中，丁家喜原本可以在中国过一种优越而富足的生活。他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制造专业，曾经在航空领域的国企担任工程师。1996年，他转行做律师后，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律师。他在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高级合伙人，业务专长是公司并购重组、投资等。在网络上，有一张他当年做商业律师时的照片，穿白色西装，看起来“春风得意”。

2010年，丁家喜开始在北京积极参与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教育平权活动。他也成了新公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2013年4月，他在北京参加了“街头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活动之后，被抓捕，并于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和他一起判刑的还有赵长青等另外三人。

“我们为了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发了十万传单，制作了一百多横幅，两次上街，七千多个签名，向全国人大及法制办要求立法财产公示，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在法庭上，丁家喜这样陈述自己的工作。

在2014年4月这场对他和另外三人的审判中，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陈述到：“我的行动微不足道，我也不后悔，这是良心告知我应该做的事。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

丁家喜在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有一张是在监狱里，被会见他的律师偷拍下来的。照片上的他，身穿囚服，胡子拉碴，却坦然地大笑着。

一位资深的媒体人记得，2017年1月，她在北京的一次偶然聚会上，见到了丁家喜。他看起来很消瘦。面对一座丰盛的菜肴，他说，自己不敢多吃，因为才出狱不久，肠胃还不能适应丰富的食物。那时，他刑满释放刚刚3个月。

获得了自由的丁家喜，还是在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见朋友。2017年，他曾去美国探望妻子和女儿，当人们都劝他留下来时，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直到2018年，他打算再次去美国探亲时，发现自己已被限制出境。

2019年12月初，他参加了厦门的这场聚会。12月26日，他迎来了另一场抓捕。

6年前，丁家喜曾在法庭上自我陈述，要做一只蝴蝶，不断扇动翅膀，以掀起社会改革的飓风。从他出狱以来，他依然坚持着这个理念，并再次付出了代价。

至今，丁家喜已经失去自由30多天，他的代理律师彭剑多次向警方提出会见，都被拒绝。警方称，丁家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目前正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无法安排律师会见。与此同时，他的妻子——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罗胜春，一直在为她的丈夫大声呼吁。

在丁家喜被抓走后，从12月29日到1月4日期间，还有至少5位律师（黄志强、刘书庆、卢庭阁、庄道鹤、卢思位）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或“寻衅滋事”罪被传讯。

1月12日，常玮平律师被陕西警方带走。



律师常玮平。网上图片

“被失业”的律师

今年36岁的常玮平，出生于1984年。他有着圆面庞，以及略带卷曲的头发，被一些朋友戏称为“胖子”。

常玮平是人权律师中的后起者。他进入律师行业时间并不长，但他的不少同行认为他业务能力精湛，对“敏感案件”毫不畏惧。

2007年，常玮平从重庆大学材料化工专业毕业，毕业后，他在海南的一家汽车企业做材料检测工程师。2010年前后，他到了北京，成为一名证券经理。

那个时候的北京，正是公民社会生机勃勃地发展的时候。在北京，他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并在参加纪录片放映会、以及一些公民线下聚会的过程中，开启了视野。也是在那段时间，他自学了法律，并报名参加了国家司法考试。

2012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的常玮平，成为一名实习律师，他的兴趣点在于刑事辩护。2014年，他担任了一起言论自由案件中被告人李蔚的代理律师。他也曾代理一些刑事案件“蒙冤者”的申诉。

从2016年开始，常玮平开始致力于一些与反性别歧视、就业歧视有关的公益案件。这一年，江西上饶的一名青年参加了当地政府的公务员招聘考试，虽然笔试和面试都得了第一名，但因为在体检中，被查出HIV阳性（携带艾滋病毒），而被拒绝录取。这位青年起诉了政府，常玮平是他的二审代理人。一审中，法院判这位青年败诉，二审中，经过常玮平律师等人的据理力争，案件以调解告终，政府给予了这位青年部分赔偿。

2017年4月2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51名律师联名致信中国人社部和卫计委，建议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的第18条予以修改，删除和“艾滋就业歧视”有关的规定，给艾滋病感染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相同的就业权利。

常玮平是这一事件的积极推动者。“我代理这些反歧视的案件，是因为我发现，这样可以激活政府的功能，通过改善政策，来推动社会进步。”常玮平曾这样说。这位年轻的律师，积

极投入涉及艾滋歧视、乙肝歧视、职场性骚扰、性别歧视，以及“滴滴”顺风车滥用垄断地位、欺凌消费者的这一类案件中。

然而，代理这些“并不敏感”的案件，最终还是不能“保护”到常玮平。2019年10月，当他代理“茅台子公司拒录HIV感染者”一案时，他的律师职业生涯已摇摇欲坠。

2018年10月14日，常玮平被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停业3个月。2018年11月22日，他执业的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被注销。2019年1月14日，在“停业”三个月期满后，按照管理部门要求，他需要找到新的律师事务所。在长达半年的时间，他至少接洽了10余家律师事务所，但每一次即将签约的时候，或者是在他将相关手续，提交到司法厅的办事窗口时，就接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表示受到压力，不能和他签约。

就这样，常玮平实际上已经处于失业状态。2020年1月13日，在他被警察抓走之后，司法局很快就下发了吊销他律师执照的公告。



2020年2月7日，武汉中心医院有已离世的李文亮医生遗像供人献花悼念。图：Getty Images

阴云下的坚持

2020年1月，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并蔓延影响到全世界。

政府救灾效率低下。尤其是在疫情开始之初，不及时向社会通告有关疫情的真实情况，这被公众普遍认为是造成疫情扩大的主要原因。

1月20日，人权律师谢燕益向政府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在这份公开信中，他要求国家和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况，包括公开政府部门的会议记录、处置方案，是否存在故意隐瞒压制公开重大疫情信息发布情况等。

谢燕益律师声称，他依据的是宪法，以及《信息公开条例》、《突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

1月22日，家住北京的赵庆律师和家住武汉的尚满庆律师，向武汉市公安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警方公布关于“训诫八位造谣者”这个案件的相关经过。在申请中，他们要求武汉市公安局公开对“8名散布谣言者”进行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处罚结果。他们要求政府公开相关的信息，实现公民的知情权。

几乎在同一时间，程海律师控告武汉公安局处理八名“造谣者”是滥用职权。而另一位人权律师燕文薪，则要求官方公布疫情中死者的年龄统计等数据，以帮助公众判断“武汉肺炎”是否对老年人更具致死性。

律师们的申请或控告，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正式回应。但在互联网上，这些申请被一些网友转发，并引起他们的广泛共鸣。2月6日深夜，当其中一位被训诫的医生李文亮去世时，这种共鸣的情绪达到顶峰。网民在互联网上自发哀悼李文亮，并迅速汇集出“我们要言论自由”的呼声。

1月1日，维权律师的协作平台“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了新年宣言：“2020，我们不要灰心丧气，相反，我们应该靠近人民，仔细倾听人民的声音，为找到切实可行的人权改善之道做好准备……”

而在各地，律师依然在为当事人的权利呼吁。一直致力于平反冤案并推动“洗冤计划”的李金星律师，虽然已于2018年被吊销律师执照，但他依然联合其他的刑辩律师，为保障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呼吁。

“如果一个国家，还有政治犯，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2017年，我在一次采访中，见到了李金星律师，他曾这样说。彼时，“709”律师抓捕事件过去不久，他依然对未来表示乐观。

“我相信基本盘还在。”他说。他认为，虽然情形艰难，但中国律师不会退场。从那时候到现在，他始终在推动“洗冤计划”。



李文足与儿子。网上图片

2019年12月26日，李文足再次会见了自己的丈夫王全璋。王全璋是“709”案件中最后一位被关押的律师。如不出意外，2020年4月，他将会出狱。李文足在自己拍摄的视频中说，丈夫出狱后，她要将他接回家中。她绝不能容忍警方像对待另一位被释放律师的做法：将他送回老家，安排严密的监控，完全没有自由。

2020年1月，纽约，丁家喜律师的妻子罗胜春为自己的丈夫在大声呼吁。支持他的，还有不久前流亡到美国的陈建刚律师。陈建刚律师因代理一系列人权案件，受到各种威胁、限制。最终，他带着孩子，离开了中国。

1月29日，常玮平律师在陕西宝鸡的故乡，和自己的亲人一起过年。他所在的村庄，和这个春节千千万万个被隔离和关闭的村庄一样，一片静寂。

“疫情会过去，而信息管控的乌云，则始终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2月6日，一位媒体人在自己的朋友圈中这样写到。

“正是生活常识的回归，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这些基本人性的回归，促成一个正常社会的回归。”

写下这些话的，是另一位流亡中的人权律师唐荆陵。在他的推特上，他引用60多年前美国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2005年去世的罗沙·帕克斯的话：“我只是厌倦了屈服，做正义之事，永无畏惧。”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舆情观察：李文亮去世后互联网上的一夜
2. 无法抵达的物资：民间救援为何迟迟送不到一线医生手上？
3. 香港口罩去哪儿？四问进口受阻、储存机制和监管缺口
4. 别让普通人李文亮，仅仅成为体制崩坏的注脚
5.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
6. 疫情阴影下，中国放开媒体审查了吗？
7. 郦菁：官僚体系与公民社会，谁是肺炎危机的答案？
8. “疫区”日记：疫情蔓延时，我回到湖北家乡
9. 读者来函：当无处可逃时，我们无法再逃离这个时代
10. 走在钢索上的各国政府：“撤侨”两头难、台湾尤甚

编辑推荐

1. 疫情阴云时的人权律师：新一轮抓捕与新一轮逃亡
2. 缺席的领袖身体：关于“亲自”的笑话与灾难中的政治奇观
3. 若放不下对婚姻的贫瘠认知，谈论《婚姻故事》就是浪费
4. 消费停摆、中小企业告急，疫情令中国经济付出哪些代价？
5. 总评奥斯卡：选择《上流寄生族》与“小丑”，学院奖颠覆自身了吗？
6. 疫情来袭，中国公民意识会重新苏醒吗？
7. 疫情预警迟到，谁在推卸责任？
8. 陈纯：饭圈救援2020，会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出路吗？

9. 新冠肺炎患者口述：我看着殡仪馆的车停在发热门诊侧面

10. 口罩、包机、台商：肺炎背后，两岸互动再无共识？

延伸阅读

“7.09”家属：从受难者到行动者的一年跋涉

一年前，6名拖儿带女的女性一夜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疑犯的“家属”，从以泪洗面、束手无策到依法申诉、国际游说，她们关注的已不仅是丈夫的自由。

覆巢：中国权利NGO生死劫（下）

中国政府管制思路骤然升级，权利倡导型NGO将迎来寒冬，过去十年的发展模式在未来基本不可能复制。

覆巢：中国权利NGO生死劫（中）

如果说许志永在公盟寄托了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规划，那么对于郭玉闪，传知行或许只是源于他对“兄弟平台”的念念不能忘。

覆巢：中国权利NGO生死劫（上）

郭玉闪与何正军的获释令关注者松了一口气。但阴影并未散去，过去十年辗转跋涉、努力孕育公民社会的中国NGO们，仍然如同一竿被打翻的巢中卵，正面临九死一生的命运。

“709大抓捕”维权律师李和平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被判监三年、缓刑四年

709律师妻子的1000天：走不完的寻夫路^[SEP]

709被捕失踪律师的妻子们，经历了国家的软禁、威胁和打压，在寻找丈夫的途中，她们期许自己不再只是“政治犯的妻子”，更成长为公民、自我觉醒的美丽女人。

疫情来袭，中国公民意识会重新苏醒吗？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